

## 基於語料庫的《一九八四》中譯本 譯者翻譯策略考察

李克莉 邵斌

本文採用語料庫語言學方法，基於自建語料庫，運用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分析方法，對《一九八四》的董樂山譯本（1998）和劉紹銘譯本（2011）的譯者翻譯策略進行研究。首先，本文運用語料庫檢索軟體對兩個譯本的形合度進行宏觀數據統計和定量分析，從而得到兩個譯本在翻譯策略上的差異。其次，以語氣詞、介詞、人稱代詞、量詞和連詞為例，從微觀層面輔以實例來佐證兩個譯本的翻譯策略差異，進行定性分析。最後，試著從社會文化、譯者的翻譯理念和目的等方面來解析兩位譯者迥異翻譯風格的成因。研究發現，兩個譯本彰顯出獨特的風格，董樂山譯本在翻譯策略上異化特徵明顯，而劉紹銘譯本偏向歸化。

關鍵詞：《一九八四》、翻譯策略、語料庫語言學、董樂山、劉紹銘、歸化、異化

收件：2015年9月10日；修改：2015年11月25日；接受：2015年12月25日

## A Corpus-based Study of the Translators' Strategies in the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Nineteen Eighty-Four*

Ke-li Li Bin Shao

This paper adopts a corpus-based approach to comparing and contrasting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employed by Dong Leshan (1998) and Lau Shiuming (2011) in their translations of George Orwell's *Nineteen Eighty-Four*.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at the hypotactic level are retrieved from the self-constructed translation corpora and analyzed quantitatively. Statistics shows that the two translators differ significantly in the employment of *modal particles, prepositions, pronouns, classifiers and conjunctions*. Equivalent textual examples from the two Chinese versions are analyzed qualitatively to illustrate the two translators' differe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he reasons for such differences are further discussed from social/cultural perspectives, and also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translators' personal ideals regarding the ultimate goal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Dong Leshan tends to adopt a foreignization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while Lau Shiuming opts for *domestication* strategies.

Keywords: *Nineteen Eighty-Fou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corpus linguistics, Dong Leshan, Lau Shiuming, domestication, foreignization

Received: September 10, 2015; Revised: November 25, 2015; Accepted: December 25, 2015

---

Ke-li Li, Lecturer, Dongfang College,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E-mail: [kljasmine@126.com](mailto:kljasmine@126.com)

Bin Shao,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E-mail: [seesky1978@163.com](mailto:seesky1978@163.com)

## 壹、前言

《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 是英國著名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 於 1949 年出版的政治小說，作品刻畫了人類在極權主義社會的生存狀態，警醒世人提防這種預想中的黑暗成為現實，被譽為世界最著名的反烏托邦和反極權的政治諷喻小說之一。小說先後被翻譯成 60 多種語言，在各國的世界文學經典排行中都名列前茅。

《一九八四》出版的次年，臺灣就出版了王鶴儀的譯本，為《一九八四》的第一個中譯本。而在中國大陸，由於受到意識形態等因素影響，奧威爾被視作「反共反蘇」專家，他的作品也成為禁書。直至 1979 年，中國大陸的第一個中譯本，即董樂山翻譯的《1984 年》，才在《國外作品選譯》期刊的第四期至第六期「內部刊載」。之後該譯本在 1985 年作為「反烏托邦三部曲」之一，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發行，但仍限「內部發行」，而且只印了 420 冊（許卉艷，2011，頁 167）。後來出版社爭相出版不同譯本，截至 2013 年，大陸公開發行的版本多達 13 個。大陸學界也紛紛從政治隱喻、極權主義、女性主義等方面對《一九八四》展開研究，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如王小梅，2005；王嵐，2000；王衛東，2002；王曉華，2009；李鋒，2008；陳勇，2008）。

由於董樂山譯本是《一九八四》在中國大陸的第一個中譯本，且董樂山在譯界又享有盛譽，故該譯本一直被視為經典譯作。目前大陸學界對《一九八四》漢譯的研究多圍繞董樂山譯本展開，研究角度多為意識形態對董樂山譯本的操縱或者董樂山翻譯思想、翻譯策略研究，研究方法多為典型的例句分析再加上評論者主觀判斷（如候利穎，2013；唐琳，2012；許曉娟，2007；楊曉舟，2003）。上述研究存在諸如研究對象與研究視角單一、研究方法主觀性較強等缺點。因此，無論在質量上還是數量上都難以與這部經典作品的地位相匹配。

針對上述問題，本文選取了《一九八四》中國大陸和港臺兩個最具

代表性的譯作——董樂山譯本（簡稱董譯本）和劉紹銘譯本（簡稱劉譯本）進行對比分析。董樂山和劉紹銘均是學貫中西、譯著頗豐的翻譯大家。兩譯本分別出版於 1979 年和 1984 年，且各自在大陸和港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兩位譯者來自秉持不同意識形態的海峽兩岸，這使得兩個譯本成為《一九八四》譯本中譯者風格共時研究的理想素材。

本文運用語料庫語言學手段，對兩個譯本的形合度進行數據統計和定量分析，然後從語氣詞、介詞、人稱代詞、量詞和連詞等方面輔以實例來佐證兩個譯本在翻譯策略上的差異，進行定性分析，最後嘗試著從社會文化、譯者的翻譯理念和目的等角度來探討影響兩位譯者迥異翻譯風格形成的原因。目前，從語料庫角度對兩個譯本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的研究還付之闕如，這種基於語料庫的翻譯研究方法對兩位譯者風格的客觀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研究人員的主觀因素，為譯者風格的科學研究提供支持。

## 貳、語料庫語言學視閥下的譯者風格研究

傳統的翻譯研究對譯者風格的關注主要著眼於譯者應該如何忠實地、最大限度地傳達原作的風格，譯者的重要性、主體性和創造性是不被重視的。隨著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以及後現代翻譯理論對譯者主體性的關注，人們開始重新審視譯者的身份，譯者的主體地位得到彰顯。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語料庫語言學開始被應用於譯者風格研究。莫娜·貝克 (Mona Baker) 開創了基於語料庫的譯者風格研究的先河，她 (2000) 從類符形符比、平均句長、敘事結構等三個方面對兩位英國文學翻譯者 Peter Bush 和 Peter Clark 的語言偏好做了示範性研究，提出了「譯者風格」(the translator's style) 這一概念，她將譯者風格比喻為人的「指紋」，認為「我們不可能寫出／說出一段文字而不包含個人風格，就像握住一個東西不可能不留下指紋一樣」<sup>1</sup> (Baker, 2000, p. 244)。貝克

<sup>1</sup> 本文所引英文文獻，均由筆者譯成中文。

的研究奠定了翻譯研究中的語料庫文體觀基礎，即借助語料庫，通過軟體對翻譯文本的形式參數進行總體統計，達到對翻譯文體或譯者風格的認識。

究竟什麼是譯者風格？根據貝克的觀點，譯者風格是「譯者在其所有翻譯文本中所表現出來的統一的規律性的語言使用模式，這些語言模式並非一次性的，而是譯者偏愛或重複出現的語言行為模式」(Baker, 2000, p. 245)。貝克所討論的譯者風格主要是譯者下意識的語言使用習慣，是不完全受源文本或原作者語言風格影響的。加布裏埃拉·薩爾達尼亞 (Gabriela Saldanha) 則將翻譯文體區分為翻譯文體 (translation style) 和譯者風格 (translator style)，指出前者將文體視為目標文本對源文本的對應方式，而後者則是譯者特有的表達方式，並且在源文本不同的情況下也會保持一致 (Saldanha, 2011b, pp. 25-50)。綜合前人的研究，Huang & Chu (2014) 提出了語料庫視閥下的譯者風格可以分為「源文本型譯者風格」(source-text type, 即 S-型) 和「目標語文本型譯者風格」(target-text type, 即 T-型)。S-型譯者風格研究關注的是譯者對源文本的應對方式，是一種有意識的語言行為。而 T-型譯者風格研究關注的是譯者下意識的語言使用習慣。貝克(2000)所關注的是 T-型譯者風格，Saldanha (2011b) 則強調了譯者風格研究的兩個維度，既關注語料庫翻譯學視閥下 T-型譯者風格，又強調了傳統譯者風格研究所關注的 S-型譯者風格研究。

繼貝克利用語料庫研究譯者風格之後，眾多西方和大陸學者都在這一領域利用語料庫從語言偏好、翻譯選材、敘事結構、翻譯策略、意識形態等多角度展開譯者風格的調查研究。研究模式主要可以分為單語類比和雙語對比兩大類，單語類比模式以貝克(2000)的方法為基礎，使用翻譯文本組成的類比語料庫(王克非、胡顯耀，2008；肖忠華，2012；胡顯耀、曾佳，2009；秦洪武、王克非，2009；馮慶華，2008；Olohan, 2003, 2004; Saldanha, 2011a, 2011b; Xiao, 2010)，雙語對比模式則借助一本多譯的平行語料庫，考察不同譯者對同一源文本的翻譯(胡開寶、朱一凡，2008；劉澤權、陳冬蕾，2010；盧靜，2014；Bosseaux, 2001,

2004, 2007; Huang & Chu, 2014; Li, Zhang, & Liu, 2011; Wang & Li, 2012; Winters, 2004a, 2004b, 2007, 2009)。經過十幾年的發展，語料庫語言學視閥下的譯者風格研究的相關理論和方法日臻完善，研究視角不斷擴大，研究成果斐然。

本文所關注的是 T-型譯者風格，即《一九八四》兩個譯本中兩位譯者在翻譯策略上的一些規律性、有意識的語言行為模式。本文在傳統譯者風格研究的對比評價模式基礎上，結合語料庫翻譯學的科學分析手段，將定量和定性相結合來考察《一九八四》的譯者翻譯策略，最後從社會文化和翻譯規範、翻譯目的等角度來探討影響兩位譯者翻譯風格差異的原因。這樣的方法能避免全憑數據說話的純技術手段分析，將科學性和藝術性進行很好的結合，能比較客觀地呈現兩個譯本的譯者翻譯策略，並為《一九八四》中譯本譯者風格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視角，豐富《一九八四》的漢譯研究。

## 參、所用語料庫及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一九八四》的兩個中譯本：董譯本和劉譯本。本研究試圖回答以下三個問題：

一、兩個譯本在翻譯策略上是否存在差異？

二、如果兩個譯本在翻譯策略上存在差異，那麼哪些語言現象可以體現和佐證其翻譯策略？

三、如果兩個譯本在翻譯策略上存在差異，那麼造成兩個譯本翻譯策略差異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我們首先自建了英文原作語料庫和《一九八四》兩個中譯本的譯文語料庫。<sup>2</sup>考慮到《一九八四》的小說

<sup>2</sup> 英文原作語料庫和《一九八四》兩個中譯本的譯文語料庫的電子文本均由作者通過掃描書籍，獲得 PDG 格式的圖片文件後，再經過 OCR 文字識別軟體識別，最終轉換成為文本文件而獲得。轉換過程出現的識別錯誤，後經作者人工校對後加以糾錯改正。

體裁，我們以蘭卡斯特漢語語料庫（The Lancaster Corpus of Mandarin Chinese，簡稱 LCMC）中的小說子庫<sup>3</sup>（General Fiction，在文中將其間稱為 LCMC (F)），作為參照庫，進行語言對比，這樣對比分析所獲得的結果將更具有針對性和說服力。我們認為，選取 LCMC (F) 作為參照庫是合理的。一則它與《一九八四》的體裁相似；二則 LCMC (F) 是 1991 年前後的文本，和《一九八四》的兩個中譯本的翻譯年代較為接近，因此能確保文中所發現的差異是因翻譯導致的差異，而非語言演變本身所致。四個語料庫的形符和類符統計情況，如表 1 所示。

表 1

四個語料庫的形符和類符統計表

	英語原文	董譯本	劉譯本	LCMC (F)
形符數	1,000,173	100,029	97,624	195,437
類符數	8,670	8,731	9,602	20,06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如果要對漢語語料進行語料庫數據統計和量化分析，首先必須要對漢語語料進行分詞處理。因為英文以空格作為天然的分隔符，而漢語詞語之間沒有分隔，這就給外國研發的語料庫檢索軟體造成了識別障礙。成功地進行中文分詞，可以達到語料庫檢索軟體自動、正確地識別語句含義的效果。本文使用了中國科學院計算機技術研究所研發的 ICTCLAS 5.0<sup>4</sup> 對董譯本和劉譯本的漢語語料進行分詞處理，詞類細

<sup>3</sup> 蘭卡斯特漢語語料庫（The Lancaster Corpus of Mandarin Chinese，簡稱 LCMC）是一個 100 萬詞次（按每 1.6 個漢字對應一個漢語詞折算）的現代漢語書面語平衡語料庫。該語料庫由英國蘭卡斯特大學語言學系設計研制，嚴格按照代表英國英語的書面語平衡語料庫 FLOB (Freiburg-LOB Corpus of British English) 抽樣方法和標準建庫，從 15 個文體類型中選取 1991 年前後的 500 篇 2,000 詞左右的樣本，語料平衡，較為客觀地反映了大陸現代漢語普通文體書面語的特徵。其中小說部分 (General Fiction) 包含了一般小說 (K)、偵探小說 (L)、科幻小說 (M)、武俠小說 (N) 和愛情小說 (P)。

<sup>4</sup> ICTCLAS (Institute of Computing Technology, Chinese Lexical Analysis System)，即漢語詞法分析系統，是由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研發的中文分詞軟體，主要功能包括中文分詞、詞性標註、命名實體識別等，可訪問 <http://ictclas.nlpir.org/> 下載獲取。

分到二類級別，比如「代詞」(r)的分類，細分到了「人稱代詞」(rr)、「指示代詞」(rz)和「疑問代詞」(ry)，然後使用 AntConc 3.4.3 軟體<sup>5</sup>進行數據統計。為了提高檢索統計的準確性，使用 AntConc 3.4.3 檢索時採用了「檢索項 + 賦碼」方式。如檢索人稱代詞「他」時，我們點擊 AntConc 主界面上方的 Concordance 選項卡，在界面下方的檢索項輸入框中輸入「他 / rr」，從而得到所需要的檢索結果。如圖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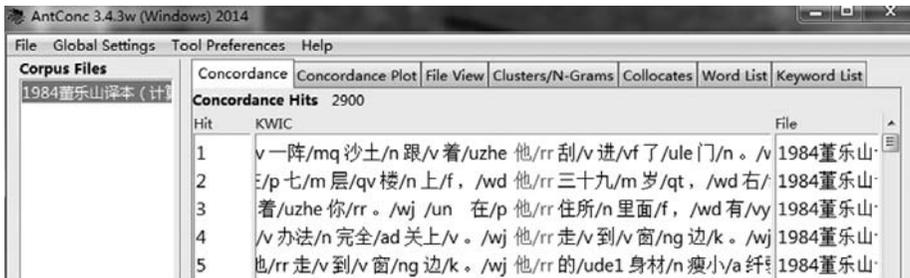


圖 1 關鍵詞「他」的檢索結果圖示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為了判斷兩個譯本間數據差異的顯著性，我們使用了對數似然性 (Log Likelihood, 下文簡稱 LL) 檢驗，對數似然性計算的工具為頻率差異 LL 率計算器<sup>6</sup>。檢驗結果中 LL 值越高，說明兩個譯本間的數據差異越大，顯化程度就越高。我們將 LL 值設定為 15.13，一般認為，LL 值  $\geq 15.13$  時，說明數據差異的信度值達到「99.99%」，差異顯著。

<sup>5</sup> AntConc3.4.3 是由日本早稻田大學科技學院 Laurence Anthony 編寫的一款語料處理軟體。該軟體具有索引、詞表生成、主題詞計算、搭配和詞族提取等多種功能，可訪問 <http://www.laurenceanthony.net/software/antcon/> 下載獲取。

<sup>6</sup> 該頻率差異 LL 率計算器由北京外國語大學許家金教授研制開發，在與梁茂成和李文中合著的《語料庫應用教程》一書中與讀者共享。

## 肆、結果與討論

### 一、兩譯本翻譯策略的差異——歸化 vs. 異化

翻譯策略是翻譯活動中，為實現特定的翻譯目的所依據的原則和所採納的方案集合。1813年德國哲學家、翻譯理論家弗裏德里希·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在《論翻譯的方法中》一文中提出：「翻譯的途徑只有兩種：一種是盡可能讓作者安居不動，而引導讀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種是盡可能讓讀者安居不動，而引導作者去接近讀者。」當時，他只是描述了這兩種方法，並未授之以什麼名稱（轉引自孫致禮，2002，頁40）。1995年美國著名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在此基礎上，突破了語言因素的限制，將視野擴展到文化、政治和詩學等層面，提出歸化和異化這對翻譯術語。按照韋努蒂的說法，歸化法是「把原作者帶入譯入語文化」，而異化法則是「接受外語文本的語言及文化差異，把讀者帶入外國情景」(Venuti, 1995, p. 20)。作為兩種翻譯策略，歸化和異化是對立統一，相輔相成的，絕對的歸化和絕對的異化都是不存在的。

那麼，董譯本和劉譯本在翻譯策略上是否呈現出了差異呢？我們將通過形合度(hypotactic level)來進行判斷。形合度，即虛詞頻率在總詞頻中所占的比例。形合度的概念是胡顯耀與曾佳(2009)提出的，可以用來判斷漢語翻譯小說的句法顯化程度，從而判斷譯者在翻譯策略上究竟是傾向異化還是歸化。

之所以憑藉虛詞在總詞頻中的比例來衡量漢語翻譯小說的句法顯化程度，源於英漢兩種語言在句子及語篇層面的語言組織手段差異，即「形合」和「意合」之間的差異。儘管學界對形合和意合的認識尚不能統一，而對於英語重形合、漢語重意合這一英漢之間的語言差異特徵似乎並不存在多大異議。美國著名翻譯理論家尤金·奈達(Eugene Nida)曾提出「就漢語和英語而言，也許在語言學中最重要的一個區別

就是意合與形合的對比」(Nida, 1982, p. 16)。「形合」指的是通過明顯的形式標記(包括詞的變化形態、詞匯的銜接等)把個體的詞組織成語句乃至語篇的語言組織手段。句中所指定界分明,句子成分組織嚴密,主從句脈絡清晰。「意合」指的是憑藉意義,即內在的邏輯關係組織語言的手段。對句子的理解,要依賴讀者的語感、經驗和語境(王菊泉, 2007)。比如,雪萊(Shelley)在《西風頌》中的名句“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這裏英文中的“if”必須存在,用以表明主句和從句之間的「假設—判斷」關係。但是,漢語句子之間的內部邏輯關係是隱而不顯的,因此可翻譯為「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沒有使用任何連接詞語,並不顯得突兀,反而覺得順暢自然,簡潔明瞭。

因此,漢語翻譯小說形式化主要變現為虛詞或者語法標記詞的使用,比較虛詞在總詞頻中所占的比例,也就是形合度,就可以獲知不同中譯本的句法顯化程度,從而判斷譯文的翻譯策略是傾向於異化還是歸化(胡顯耀、曾佳, 2009, 頁 74)。漢語翻譯小說的形合度較高,虛詞總詞頻偏高,說明譯者更多地受到了英語源語的影響,譯文使用了較多的介詞、代詞、數詞、量詞等虛詞,翻譯策略傾向於異化;反之,漢語翻譯小說形合度較低,虛詞總詞頻偏低,但是為了使譯文更貼近於目標語漢語,譯者反而會適當的增加語氣詞、連詞等虛詞,翻譯策略傾向於歸化。

漢語語言學家對漢語實詞和虛詞的劃分標準和類型,至今仍持有不同意見,其中副詞和代詞的爭議最大。我們採納了呂叔湘與朱德熙(2013)的觀點,將名詞、動詞、形容詞歸為實詞,語氣詞、連詞、代詞、數詞、介詞、量詞、副詞、助詞、處所詞、方位詞等歸為虛詞,這個分類標準也是眾多大陸學者所普遍採納的(如尚忠華, 2012; 胡顯耀、曾佳, 2009; 劉澤權、陳冬蕾, 2010)。

我們在使用 ICTCLAS 5.0 對兩個譯本進行了分詞和詞性標註的基礎上,使用 AntConc3.4.3 對兩個譯本的虛詞進行了統計。表 2 是具有顯著性差異(即 LL 值 $\geq 15.13$ )的虛詞列表,包含了詞頻、比例和 LL 值。

表 2

兩譯本具有顯著性差異的虛詞詞頻、比例和 LL 值統計

虛詞	董譯本		劉譯本		LL 值
語氣詞	976	(0.98%)	1452	(1.49%)	105.87
介詞	4349	(4.35%)	3755	(3.85%)	30.32
代詞	11018	(11.01%)	10035	(10.28%)	25.11
數詞	4200	(4.20%)	3690	(3.78%)	21.75
量詞	2961	(2.96%)	2557	(2.62%)	20.59
連詞	2838	(2.84%)	3077	(3.15%)	16.3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經過統計和計算，董譯本和劉譯本的虛詞總量分別是「51517」和「48061」，形合度分別為「51.50%」和「49.23%」。兩個譯本的虛詞比率均高於 LCMC (F)「36.81%」的比例，這也印證了前人關於漢語翻譯小說比漢語原創小說使用更多的虛詞的研究發現（王克非、胡顯耀，2008；尚忠華，2012；胡顯耀、曾佳，2009；Xiao，2010）。進一步對數似然率測試，結果顯示兩譯本的形合度差異「+2.27」具有統計顯著性「LL=50.61」。數據說明，形合度較高的董譯本使用了較多的虛詞，在翻譯策略上傾向異化；而形合度較低的劉譯本使用了較少的虛詞，在翻譯策略上傾向於歸化。

## 二、兩譯本不同翻譯策略的具體體現

譯者從事翻譯時採用什麼「翻譯方法」不是任意的，而是基於一定的翻譯策略。如前所述，翻譯策略分為異化和歸化兩大類。這兩大翻譯策略各自包含了一些翻譯方法，異化策略下的翻譯方法都是原文作者取向型的，在翻譯中具體表現為譯者要盡量保留原文的語言、文化等特質，向原作者靠攏。歸化策略下的翻譯方法都是譯文接受者取向型的，

在翻譯中具體表現為譯者要盡量使用目的語讀者喜聞樂見的語言、文化要素來替換源語中的語言、文化要素，回歸目的語的語言和文化規範。

我們將以兩譯本中具有顯著性差異的虛詞，即語氣詞、介詞、人稱代詞<sup>7</sup>、量詞、和連詞為例，來佐證兩個譯本在翻譯策略上的差異。

### （一）語氣詞

在語言的人際交流功能中，語氣起著重要的作用。英語和漢語在語氣表達方式上，有相同或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兩種語言都有在句中作獨立成分的感嘆詞，如「哎、唉、哎呀、哼、噢……」和“Ah, Aha, Oh, Dear, God, My Goodness, etc.”；而漢語除了感嘆詞外，還有語氣詞，如「嗎、呢、吧、啊、了……」。漢語的語氣詞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附著在句子或句子某個部分後面來表示陳述、感嘆、疑問等語氣，與印歐語系語言相比，語氣詞是漢語特有的一類詞匯。英語小說漢譯時，語氣詞的添加可以完美地再現英語原文的不同語氣，不僅可以達到傳神的目的，而且還可以使譯文更加清晰和連貫，符合漢語的行文習慣（劉澤權、陳冬蕾，2010，頁11）。和異化翻譯策略的中譯本相比，歸化翻譯策略的中譯本會使用更多的語氣詞。

兩個譯本的語氣詞數據統計結果詳見表2。由表2可知，兩個譯本語氣詞的詞頻和比例均低於LCMC (F)，即「3235」和「1.66%」，這也印證了語氣詞在漢語原創小說中比在漢語翻譯小說中使用更普遍的研究發現（肖忠華，2012；劉澤權、陳冬蕾，2010）。兩個譯本中主要語氣詞詞頻統計，如下表3所示。

<sup>7</sup>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之所以以「人稱代詞」而不是「代詞」來進行佐證比對，是因為英語和漢語在代詞的用法上有很大的不同，英語代詞種類較多，除了漢語三種代詞（人稱代詞、指示代詞和疑問代詞）外，還擁有漢語所沒有的五種代詞。我們對兩個譯本中的人稱代詞、指示代詞和疑問代詞分別進行了LL值統計，統計結果為20.43、22.40和2.78，其中疑問代詞並不具備顯著性差異。由於篇幅所限，我們將以代詞中所占比例最高的人稱代詞為例來具體說明兩個譯本之間的差異。

表 3

兩譯本主要語氣詞詞頻統計

	吧	嗎	呢	呀	啊	唉	啦	呵
董譯本	33	95	57	5	23	8	1	0
劉譯本	124	76	94	40	4	3	27	3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顯然，由表 2 和表 3 可知悉，在語氣詞的使用上，劉譯本更接近於漢語原創小說的行文習慣，比董譯本使用了更多的語氣詞，在翻譯策略上偏向歸化，而董譯本更傾向異化。如〈例一〉所示：

〈例一〉

英文原文：‘Where was St Martin’s?’ said Winston. ‘St Martin’s? That’s still standing. It’s in Victory Square, alongside the picture gallery. A building with a kind of triangular porch and pillars in front, and a big flight of steps.’ (Orwell, 2006, p. 86)

董譯本：「聖馬丁教堂在哪裏？」溫斯頓問。

「聖馬丁教堂？那還在。在勝利廣場，畫廊旁邊。是座門廊呈三角形，前面有圓柱和很高的臺階的房子。」（董樂山，1998，頁 81）

劉譯本：「聖馬丁教堂在哪裏？」溫斯頓問道。

「聖馬丁？呀，今天還在呢，就在勝利廣場嘛，與畫廊並立，就是三角門廊、前面有不少柱子和一道長長的石階的那棟。」（劉紹銘，2011，頁 93）

在〈例一〉中，原文未使用一個感嘆詞，董譯本和原文保持了一致，在語氣詞的使用上不增不減，是典型異化翻譯策略的體現。而劉譯本則增加了三個不同語氣詞「呀、呢、嘛」的使用。〈例一〉中主角溫斯頓

通過店主無意哼唱的歌謠得知了「聖馬丁教堂」的存在，溫斯頓吃驚於「聖馬丁教堂」的存在，而店主卻對此了如指掌。因此，在回答溫斯頓的關於「聖馬丁教堂在哪裏」的疑問時，「呀」體現了店主對溫斯頓竟然不知道聖馬丁教堂存在的驚訝之情，「呢」強調了「聖馬丁教堂的存在」，而「嘛」則體現了店主認為「聖馬丁教堂的存在」是多麼顯而易見的事實之語氣。這些語氣詞的添加可以形象地再現原文的語氣，傳達原文的含義，是劉譯本歸化翻譯策略的一個很好體現。

## （二）介詞

王力(1990)等語言學家發現，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伴隨著大量西方文學作品的漢譯，漢語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英語等印歐語言的影響，出現了漢語語法歐化的現象。介詞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了影響，現代漢語中產生了「關於、對於、對、在 N 的 V (之) 下」等新興的介詞和介詞結構。

兩個譯本的介詞數據統計結果詳見表 2。和 LCMC (F) 的介詞詞頻和比例「6614」和「3.38%」相比，兩個譯本都比 LCMC (F) 使用了更多的介詞，這一結果也印證了漢語翻譯小說的介詞使用頻率明顯高於漢語原創小說的研究發現（王克非、胡顯耀，2008；肖忠華，2012；胡顯耀、曾佳，2009；秦洪武、王克非，2009）。兩個譯本中董譯本的介詞比例最高，說明董譯本受到更多源語的影響，翻譯策略上傾向異化；而劉譯本更接近於漢語的行文習慣，以歸化策略為主。兩個譯本中主要介詞詞頻統計，如下表 4 所示。

表 4

兩譯本主要介詞詞頻統計

	在	把	從	被	往	通過	當	關於
董譯本	1874	484	240	92	34	30	19	18
劉譯本	1231	424	169	147	18	3	8	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由於篇幅所限，我們以「在」為例來進一步說明兩個譯本翻譯策略上的差異。兩個譯本「在」的頻次差異存在顯著性，其LL值為「120.3」。

漢語存在句的主語通常是一個處所詞語，而且通常並不在這些處所詞前添加介詞。英語則不同，處所詞語的前面往往都要使用介詞。如前所述，受到英語等印歐語言的影響，漢語中存在句使用「在」的現象慢慢多了以來。經過統計，董譯本、劉譯本和LCMC (F) 中存在句「在」的詞頻分別是「1874」、「1231」和「2369」，比例分別是「1.87%」、「1.26%」和「1.21%」，兩譯本均高於LCMC (F)，其中又以董譯本的比例最高。「在」的使用進一步說明，董譯本更多受到了英語源語的影響，以異化翻譯策略為主。如〈例二〉所示。

#### 〈例二〉

英文原文：Always **in** your stomach and **in** your skin there was a sort of protest, a feeling that you had been cheated of something that you had a right to. (Orwell, 2006, p. 52)

董譯本：**在**你的肚子裏，**在**你的肌膚裏，總發出一種無聲的抗議，一種你被騙掉了有權利享受的東西的感覺。（董樂山，1998，頁48）

劉譯本：你的肚子和皮膚每時每刻都向你抗議，使你覺得像被剝奪了一些本來屬於你的東西。（劉紹銘，2011，頁57）

在〈例二〉中，董譯本顯然更多地受到了英語源語的影響，在處所詞語前添加了「在」，是異化翻譯策略的體現。而劉譯本則按照漢語傾向使用動詞，敘述呈動態化的習慣，將原文中的名詞「protest」動詞化，而原文的兩個存在句則轉譯為了兩個名詞作主語，進行了歸化處理。

### （三）人稱代詞

目前大陸不少研究（王克非、胡顯耀，2008；尚忠華，2012；秦洪

武、王克非，2009）都顯示漢語翻譯小說中人稱代詞，尤其是第三人稱代詞「他」的使用頻率顯著高於漢語原創小說。人稱代詞顯化的原因可能主要源於：其一，英漢語言的差異。英語廣泛使用第三人稱代詞，用來回指前文中提到的人或者事。而漢語則通過省略主語、零指代、重複名詞等方式來實現回指。受到英語源語的影響，翻譯漢語傾向於將指代關係顯化。其二，英文人名譯為漢語時一般採取音譯方式，這些音譯的英文人名一般比較冗長，這些冗長的人名不斷重複出現將有礙小說的可讀性，於是譯者便傾向於採取人稱代詞來替代冗長的人名。那麼，兩個譯本在人稱代詞使用上是否具有翻譯漢語的普遍特點？兩個譯本人稱代詞的差異能否體現其不同的翻譯策略？我們對兩個譯本中的主要人稱代詞及其複數形式和所有格的頻率進行了統計，並以LCMC (F) 作為參考，來對上述問題進行解答。

經過統計和計算，董譯本、劉譯本和 LCMC (F) 的人稱代詞詞頻分別為「6992」、「6309」和「10921」，比例分別為「6.99%」、「6.46%」和「5.59%」。數據說明兩個譯本都出現了人稱代詞顯化的現象，其中以董譯本的比例為最，說明董譯本更多受到英語源語影響，以異化翻譯策略為主。兩個譯本中主要人稱代詞詞頻統計，如下表 5 所示。

表 5

兩譯本主要人稱代詞詞頻統計

	他／他的	她／她的	他們／她們	我／我的／我們	妳／妳的／妳們
董譯本	3400	675	830	909	1178
劉譯本	2819	623	736	913	1218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經過進一步統計，兩個譯本人稱代詞類別中，以第三人稱代詞「他」的 LL 值最為顯著 (LL=32.85)。除了受到《一九八四》敘述視角的影響外，應該和董譯本更多地受到了英語源語的滲透，採取異化的翻譯策略

有關。試舉一例：

〈例三〉

英文原文：Winston was dreaming of **his** mother. **He** must, **he** thought, have been ten or eleven years old when **his** mother had disappeared. (Orwell, 2006, p. 25)

董譯本：溫斯頓夢見**他的**母親。**他想**，**他**母親失蹤的時候**他**大概是十歲，或者十一歲。（董樂山，1998，頁25）

劉譯本：溫斯頓夢見了**他**母親。母親失蹤那年，自己一定是十歲吧？再不然就是十一歲。（劉紹銘，2011，頁29）

在〈例三〉中，董譯本更多地受到英語源語的影響，使用了四個代詞「他」，和原文保持了一致。而劉譯本更多受到漢語行文習慣的影響，由於前後兩句主語一致，他在第二句中則採用省略主語和零指代等方法隱化了原句中的代詞，從而造成〈例三〉中「他」的詞頻減少。

#### （四）量詞

肖忠華 (2012) 和徐欣 (2010) 等學者研究發現漢語原創小說中的量詞使用頻率大大高於漢語翻譯小說。這可能是因為英漢語使用量詞的區別。漢語是公認的量詞語言而英語不是，結果是英語中只有對不可數名詞計量時量詞的使用才具有強制性，而漢語中的所有名詞都必須帶量詞。因此，漢語中的量詞使用頻率為英語的 29 倍（肖忠華，2012，頁 137）。兩個譯本的量詞數據統計結果詳見表 2。LCMC (F) 的量詞詞頻和比例分別為「6223」和「3.18%」，均高於董譯本和劉譯本，這一結果印證了前人的研究發現。

英語語言中大量使用冠詞，英語冠詞與名詞數的概念緊密相連，是英語中出現頻次最高的虛詞。而漢語中則沒有與英語冠詞對應的詞類，

在英譯漢的過程中，很多譯者受英語源語的影響，傾向用顯化的表達來處理英語中的冠詞，過度使用漢語量詞，從而出現數量短語高頻出現的現象，經常出現的結構一般為「數詞 + 量詞 + 定語 + 名詞」或者「數詞 + 量詞 + 名詞」（秦洪武、王克非，2009，頁 134）。兩個譯本中三類量詞詞頻統計，如下表 6 所示。數據說明，董譯本更多的受到英語源語的影響，使用了更多的量詞，是異化翻譯策略的體現。

現代漢語常用量詞就有五六百個，分類複雜。ICTCLAS 將所有量詞標註為三大類，即數量詞 (mq)、動量詞 (qv)、時量詞 (qt)，這個分類標準也是眾多大陸學者在從事漢語譯文語料庫研究時所普遍採納的（如肖忠華，2012；胡顯耀、曾佳，2009）。「數量詞」表示人和事物的計算單位，如「一陣」、「一個」；「動量詞」表示表示動作或變化次數的單位，如「多次」、「幾遍」；「時量詞」表示動作的發生時間或延續時間的計量單位，如「四五十歲」、「幾年」。

表 6

兩譯本三類量詞詞頻統計

	數量詞	動量詞	時量詞
董譯本	1854	617	490
劉譯本	1565	587	40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進一步對數似然率測試，三類量詞中數量詞的 LL 值最為顯著 (LL=17.93)。數量詞中以數詞「一」+「量詞」+「名詞」或者數詞「一」+「量詞」+「定語」+「名詞」的結構居多。例如：

〈例四〉

英文原文：It was a lean Jewish face, with a great fuzzy aureole of white hair and a small goatee beard—a clever face, and yet

somehow inherently despicable, with a kind of senile silliness in the long thin nose, near the end of which a pair of spectacles was perched. (Orwell, 2006, p. 10)

董譯本：這是一張瘦削的猶太人的臉，一頭蓬鬆的白髮，小小的一撮山羊鬍鬚——一張聰明人的臉龐，但是有些天生的可鄙，長長的尖尖的鼻子有一種衰老性的癡呆，鼻尖上架著一副眼鏡。（董樂山，1998，頁11）

劉譯本：戈斯坦是猶太人，臉孔瘦削，滿頭茸茸的白髮，留著山羊鬍子。這相貌聰明伶俐，可是妳總覺得這人天性無恥卑鄙。他那副眼鏡垂落在那長而單薄的鼻梁上，這又給人一種年邁蠢鈍的感覺了。（劉紹銘，2011，頁12）

在〈例四〉中，原文中共使用了六個不定冠詞「a」，董譯本採用了六個「一+量詞」的結構，和原文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在句式上也和原文保持了高度的相似，這都體現了其異化翻譯策略的使用。而劉譯本只使用了一個「一+量詞」的結構，根據漢語的行文習慣，進行了語義和句式的調整，是歸化翻譯策略的使用。

### （五）連詞

英語重形合，漢語重意合。漢語句子之間的關係往往是隱而不顯的，而英語句子之間的關係往往通過 when, where, if, so, because, although 等連詞表達出來。英譯漢的過程中，受到英語源語的影響，譯者一般會在分句與分句之間增添適當的連詞，把整句話在形式上連接起來，從而造成翻譯漢語中連詞使用頻率明顯提高。

兩個譯本的連詞數據統計結果詳見表 2。和 LCMC (F) 的連詞詞頻和比例「3859」和「1.97%」相比，兩個譯本都比 LCMC (F) 使用了更多的連詞，這一結果印證了漢語翻譯小說比漢語原創小說使用更多的連詞

的研究發現（尚忠華，2012；秦洪武、王克非，2009；Xiao，2010）。我們對主要連詞類別進行進一步統計，發現兩個譯本的差異主要體現在轉折連詞「雖／雖然、但／但是、可／可是」的使用上。兩個譯本轉折連詞分別為「1180」和「1354」，LL 值為「16.47」。下表 7 是兩個譯本中主要轉折連詞的頻率統計：

表 7

兩譯本中轉折連詞詞語匯總

	雖（然）	但（是）	不過	而（是）	只是	可（是）	然而	反而	卻
董譯本	33	566	131	236	47	50	6	3	108
劉譯本	153	552	62	284	44	131	1	6	12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劉澤權與陳冬蕾 (2010) 研究顯示，英譯漢時，連詞的添加與否，和譯者對原文的理解，以及譯者的翻譯風格有很大關係。我們認為劉譯本比董譯本使用更多轉折關係連詞的原因，除了劉譯本更傾向於成對使用「雖（然）……但（是）／卻／可是」的結構，還和他傾向於根據自己的理解，將英語原句中隱含的邏輯關係，予以明晰化有很大關係。如〈例五〉：

## 〈例五〉

英文原文：With one hand in her pocket and a piece of bread and jam in the other, Julia wandered about the room, glancing indifferently at the bookcase, pointing out the best way of repairing the gateleg table, plumping herself down in the ragged arm-chair to see if it was comfortable, and examining the absurd twelve-hour clock with a sort of tolerant amusement. (Orwell, 2006, p. 126)

董譯本：裘莉亞一手插在口袋裏，一手拿著一片抹了果醬的麵包，在屋子裏走來走去，隨便看一眼書架，指出最好怎麼修理折疊桌，一屁股坐在破沙發裏，看看是不是舒服，有點好玩地仔細觀察一下座鐘的十二小時鐘面。（董樂山，1998，頁 120）

劉譯本：朱麗亞一手插在口袋裏，一手捧著擦了果醬的麵包，在房間四邊瀏覽著。她對書架並不注意，但對怎樣修理桌子卻有獨特之見。過後，她就倒在扶手椅上，要看看是否坐得舒服。那個古老的鐘她倒端詳了好久，覺得它雖然古怪，卻是滿好玩的。（劉紹銘，2011，頁 137）

在〈例五〉中，原句是典型的英文長句，使用了一個介詞短語和四個現在分詞結構來說明主語 Julia 的狀態和動作，句中並未使用任何轉折連詞。董譯本忠實於原文，譯文沒有使用連詞，在句式上也未做大的調整。而劉譯本則根據句義，將一句調整為三句，並且根據句中副詞 *indifferently* 和形容詞 *absurd*、*tolerant* 的含義，將英文原句中隱含的轉折關係予以明晰，這樣的調整是貼近漢語行文習慣的歸化翻譯策略的使用。

### 三、譯者風格成因探悉

在翻譯的過程中，譯作誕生時期的文化因素、翻譯理念、文學思潮以及譯者獨特的翻譯理念和目的等因素都會導致不同譯者風格的形成。

1978 年董樂山開始翻譯《一九八四》時，中國大陸剛剛經歷了文革浩劫，開始對外開放，社會處於重要的轉型時期。與文革時期視外國文學作品，尤其是英美文學作品為「資產階級毒素」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此時文學界掀起了第二次翻譯高潮，英美文學作品被大量地譯介進來。人們開始認真思考國家民族和人類的未來命運，希望通過閱讀西

學著作來解決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此時的譯者擔負起了解放思想的使命，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曾經歷反右運動和文革的董樂山從《一九八四》中發現了許多與現實生活相似的東西，他認為：「光明正大地、毫無隱晦地正視這段歷史，讓人民和歷史做出應有的判斷，是任何一個真正的革命者的不可推卸的義務」（1988，頁 298）。顯然，董樂山肩負的歷史責任感，使得他在翻譯《一九八四》時以忠實傳遞原作的內容為首要目標，在翻譯策略上採取了貼近原作的異化翻譯策略。

而且，董樂山翻譯《一九八四》時，中國大陸翻譯界推崇的標準依舊是嚴復的「信達雅」三原則，其中又特別強調「信」，我們可以從葛傳槩（1980）、劉重德（1982）等翻譯大家的文章中管窺一二。葛傳槩（1980，頁 1）指出：「說‘信’也好，說‘忠實’也好，翻譯必須在把原文變成另一種文字時，做到不增、不減、不改。」劉重德（1982，頁 26）指出：「忠實性是翻譯的準則……嚴格說來，忠實性乃是信達切三原則的概括。」深受當時翻譯標準影響的董樂山也特別強調對原文的理解和忠實再現並指出：「翻譯工作者的首要職責，就是把原文忠實地介紹給譯文的讀者」（1987，頁 37）。他還認為：「在翻譯的過程中，不能稍許摻雜個人主觀的成分。他既不能嫌原文表達太多樣而任意簡化（說得不客氣一些，這是偷懶），也不能因原文用詞晦澀而擅自解釋（這是把讀者當阿斗），更不能把平淡的原文譯得詞藻華麗（這是賣弄自己）」（同上，頁 38）。毫無疑問，大陸譯介當時推崇的翻譯思想和標準，深深影響到了董樂山的翻譯策略。

作為「香港散文五大家」之一的劉紹銘翻譯《一九八四》時，正是在 1984 年，其翻譯初衷更多源於民主自由思想之傳播和個人趣味。劉紹銘把《一九八四》視作改變自己一生的書籍（劉紹銘，2000，頁 135）。介紹這本書給劉紹銘的人，是他生命中很重要的老師：夏濟安。上世紀 60 年代，他在臺灣大學外文系讀書時，夏先生對他說：「書是一輩子也念不完的，但像卡夫卡的《審判》、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和奧威爾的《一九八四》這一類的書，我們讀書人有責任閱讀和傳播」

(劉紹銘, 2009)。其譯本序言「越多人看《一九八四》，自由就多一份保障」也許是對夏濟安先生期望的最好詮釋。1984年，受到香港《信報》之邀後，他每天在《信報》上連載兩千字。《信報》在香港甚具權威性，以倡導「自由、民主」的政經評論而聞名。這無疑也使得劉紹銘在翻譯《一九八四》的過程中，享有更多自由創作的空間，缺少了董樂山從事翻譯時來自大陸特殊階段意識形態的束縛。

而且，劉紹銘對文學翻譯的理解和標準，也與董樂山有很大不同。在與臺灣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的單德興先生進行的訪談中，對於「在翻譯時，是不是說，作者 (author) 本人有更大的權威 (authority)，在針對另一種語言的讀者時，有比較大的揮灑空間」的提問，劉紹銘 (2014) 認為：「身為作者，我會希望保留內容大意，但絕不會逐字逐句翻譯。何必讓自己束手縛腳呢？我覺得中文和英文，或是任何兩種不同的語言之間，都不會有太多的共同點，各有各的世界和表達方式。」他還曾經指出「假如文學創作可以盡其情性，發揮個人獨特的風格，那麼，文學作品的翻譯，應該得到相同的待遇」（轉引自劉靖之，1991，頁35）。可見，劉紹銘在進行文學作品的翻譯時，更傾向於二次創作，在忠實原文意思的基礎上，發揮個人獨特的風格。

## 伍、結論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文通過語料庫的實證考察，運用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分析方法，對《一九八四》的董樂山譯本和劉紹銘譯本的譯者翻譯策略進行考察，並且從社會文化、譯者的翻譯理念和目的等方面解析了兩位譯者迥異翻譯策略的成因。我們的主要發現如下：

首先，董譯本和劉譯本在翻譯策略上呈現出了各自特有的風格。董樂山的翻譯策略傾向異化，使用了較多的人稱代詞、介詞和量詞，譯文表達更貼近英語原文。劉紹銘則更傾向於歸化的翻譯策略，根據漢語的行文習慣，適當的添加了語氣詞和連詞，對譯文進行「二次創作」來迎

合漢語讀者的審美習慣。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歸化翻譯策略和異化翻譯策略並非絕對對立的、非此即彼的。沒有百分之百的異化譯文，也沒有百分之百的歸化譯文。任何譯作，都是譯者在歸化策略和異化策略交織作用下產生的混合體。董譯本和劉譯本也不例外，只不過董譯本偏向異化策略，而劉譯本偏向歸化策略。另外，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文化和譯者特有的翻譯理念都會對其翻譯策略的選擇產生深刻的影響。

其次，本文的研究結果證明通過「形合度」，即虛詞在總詞頻中的比例，可以有效地用來判斷英文小說不同中譯本的譯者翻譯策略究竟是傾向歸化還是異化。

本文基於語料庫的《一九八四》譯者翻譯策略研究，為《一九八四》多個中譯本的對比分析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但是本文的研究僅侷限於兩個中譯本間的語內對比，與其他更多中譯本之間的對比研究以及與英文原作的語際對比研究，都還有待進一步展開，從而促進《一九八四》譯者風格研究更加全面、深入的展開。另外，兩位譯者都是著譯豐富的大家，本研究所顯示的翻譯策略傾向是否在其他翻譯作品也有同樣體現，其翻譯作品和創作作品之間的文體是否存在差異，這些都是我們下一步將要開展的研究。

## 參考文獻

### 中文文獻

- 王力(1990)。王力文集(第十一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 王小梅(2005)。《一九八四》中的男性中心論。當代外國文學，3，87-94。
- 王克非、胡顯耀(2008)。基於語料庫的翻譯漢語詞彙特徵研究。中國翻譯，6，16-21。
- 王嵐(2000)。《1984年》中人性的探求。當代外國文學，4，152-158。
- 王菊泉(2007)。關於形合與意合問題的幾點思考。外語教學與研究，6，409-416。
- 王衛東(2002)。孤獨的遊魂：喬治·奧維爾與帝國主義。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6，76-80。
- 王曉華(2009)。喬治·奧威爾反極權主義思想的文化解讀。山東社會科學，4，147-150。
- 呂叔湘、朱德熙(2013)。語法修辭講話。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鋒(2008)。當代西方的奧維爾研究與批評。國外理論動態，6，87-91。
- 尚忠華(2012)。英漢翻譯中的漢語譯文語料庫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 胡開寶、朱一凡(2008)。基於語料庫的莎劇《哈姆雷特》漢譯文中顯化現象及其動因研究。外語研究，2，72-81。
- 胡顯耀、曾佳(2009)。對翻譯小說語法標記顯化的語料庫研究。外語研究，5，72-79。
- 候利穎(2013)。意識形態對文學翻譯的操控——以《一九八四》董樂山中譯本為個案(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湖南師範大學，長沙市。

- 唐琳（2012）。翻譯生態環境中譯者的適應與選擇——以董樂山漢譯 *Nineteen Eighty-four* 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湘潭大學，湘潭市。
- 孫致禮（2002）。中國的文學翻譯：從歸化趨向異化。《中國翻譯》，1，40-44。
- 徐欣（2010）。基於多譯本語料庫的譯文對比研究——對《傲慢與偏見》三譯本的對比分析。《外國語》，2，53-59。
- 陳勇（2008）。試論喬治·奧維爾與殖民話語的關係。《外國文學》，3，55-62。
- 秦洪武、王克非（2009）。基於對應語料庫的英譯漢語言特徵分析。《外語教學與研究》，2，131-136。
- 梁茂成、李文中、許家金（2013）。《語料庫應用教程》。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 許卉艷（2011）。奧威爾《一九八四》在中國的翻譯與出版。《名作欣賞》，5，166-168。
- 許曉娟（2007）。譯為心聲——董樂山翻譯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南開大學，天津市。
- 馮慶華（2008）。母語文化下的譯者風格。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楊曉舟（2003）。評董樂山《一九八四》譯本與原著之間的動態對等（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市。
- 葛傳槩（1980）。漫談由漢譯英問題。《翻譯通訊》，2，1-8。
- 董樂山（1987）。譯余廢墨。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董樂山（譯）（1988）。中午的黑暗（原作者：A. Koestler）。北京：作家出版社。（原著出版年：1941）
- 董樂山（譯）（1998）。一九八四（原作者：G. Orwell）。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原著出版年：1948）
- 劉重德（1982）。談翻譯的忠實性。《翻譯通訊》，4，26-29。
- 劉紹銘（2000）。情到濃時。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劉紹銘 (2009 年 8 月 6 日)。奧維爾六十年祭。時代周報。取自 <http://www.bjnews.com.cn/opinion/2010/04/13/25251.html>
- 劉紹銘 (2014 年 9 月 14 日)。翻譯可以「活在借來的生命」中。晶報。取自 [http://news.ifeng.com/a/20140914/41975405\\_0.shtml](http://news.ifeng.com/a/20140914/41975405_0.shtml)
- 劉紹銘 (譯) (2011)。一九八四 (原作者: G. Orwell)。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原著出版年: 1948)
- 劉靖之 (1991)。翻譯新論集。香港: 商務出版社。
- 劉澤權、陳冬蕾 (2010)。英語小說漢譯顯化實證研究——以《查泰萊婦人的情人》三個中譯本為例。外語與外語教學, 4, 8-13。
- 盧靜 (2014)。歷時視閥下的譯者風格研究——語料庫輔助下的《聊齋誌異》英譯本調查。外國語, 4, 20-31。

#### 英文文獻

- Anthony, L. (2015, January 16). Laurence Anthony's Software [Website]. Retrieved from <http://www.laurenceanthony.net/software/antconc/>
- Baker, M. (2000).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 *Target*, 12(2), 241-266.
- Bosseaux, C. (2001). A study of the translator's voice and style in the French translations of Virginia Woolf's *The Waves*. In M. Olohan (Ed.), *CTIS occasional papers* (Vol. 1, pp. 55-75). Manchester, England: CTIS, UMIST.
- Bosseaux, C. (2004). Point of view in translation: A corpus-based study of French translation of Virginia Woolf's *To the Lighthouse*.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5(1), 107-122.
- Bosseaux, C. (2007). *How does it feel? Point of view in translation: The case of Virginia Woolf into French*. Amsterdam, Netherlands: Rodopi.
- Huang, L., & Chu, C. (2014). Translator's style or translational style? A corpus-based study of style in translated Chinese novels. *Asia Pacific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1(2), 122-141.

- Li, D., Zhang, C., & Liu, K. (2011). Translation style and ideology: A corpus-assisted analysis of two English translation of *Hongloumeng*.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 26(2), 153-165.
- Nida, E. A. (1982). *Translating meaning*. San Dimas, California: 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 Olohan, M. (2003). How frequent are the contractions: A study of contracted forms in the translational English corpus. *Target*, 15(1), 59-89.
- Olohan, M. (2004). *Introducing corpora in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Orwell, G. (2006). *Nineteen eighty-four*. London, England: Penguin.
- Saldanha, G. (2011a). Style of translation: The use of foreign words in translations by Margaret Jull Costa and Peter Bush. In A. Kruger, K. Wallmach & J. Munday (Eds.),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pp. 237-258). London, England: Continuum.
- Saldanha, G. (2011b). Translator Style: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Translator*, 17(1), 25-50.
- Venuti, L. (1995).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Wang, Q., & Li, D. (2012). Looking for a translator's fingerprints: A corpus-based study on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Ulysses*.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 27(1), 81-93.
- Winters, M. (2004a). German translations of F. Scott Fitzgerald's *The beautiful and damned*: A corpus-based study of modal particles as features of translator's style. In I. Kemble (Ed.), *Using corpora and databases in translation* (pp. 71-88). Portsmouth, England: University of Portsmouth.
- Winters, M. (2004b). F. Scott Fitzgerald's die schönen und verdammten: A corpus-based study of loan words and code switches as features of translators' style. *Language Matters, Studies in the Languages of Africa*, 35(1),

248-258.

Winters, M. (2007). F. Scott Fitzgerald's die schönen und verdammten: A corpus-based study of speech-act report verbs as a feature of translators' style. *Meta*, 52(3), 412-425.

Winters, M. (2009). Modal particles explained: How modal particles creep into translations and reveal translators' styles. *Target*, 21(1), 74-97.

Xiao, R. (2010). How different is translated Chinese from native Chinese? A corpus-based study of translation universa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15(1), 5-35.

